

## 第六章 重新思索閱聽人的思辨能力

本章試圖回到研究核心問題，重新思索閱聽人的思辨能力。首先，本研究將整理經驗資料分析結果，提出閱聽人思辨的可能歷程。再者，將以研究結果對於閱聽人研究提出建議。最後，本研究將檢討鄂蘭思想體系的運用與以網際空間作為研究場域的二個研究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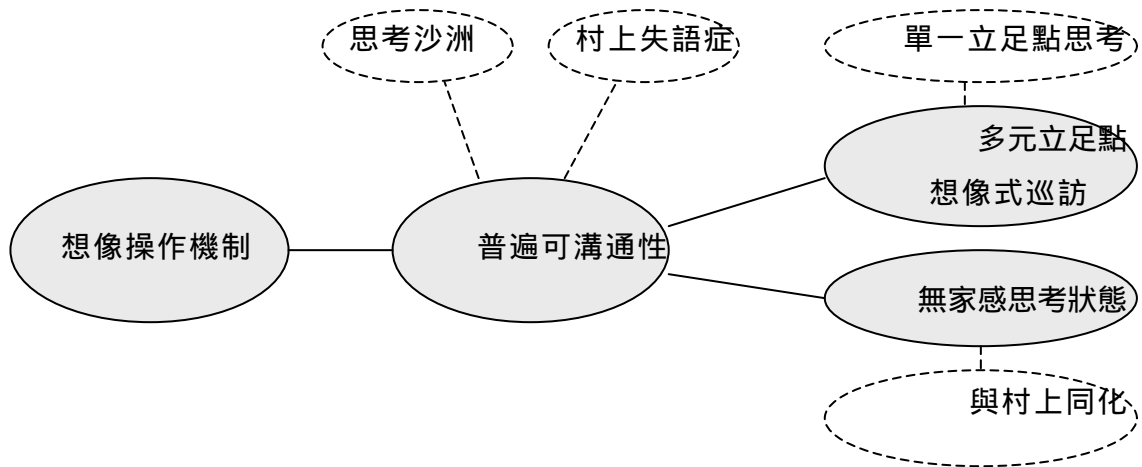
### 第一節 閱聽人思辨歷程

本研究自始問題核心均試圖瞭解閱聽人如何穿梭於複雜的媒介景象，從媒介影像洪流中追尋自我意義，展開思辨過程？再者，如果閱聽人的思辨能力是一種思考過程的展現，而非最終的結果，那麼，是否存在著某項研究工具或理論框架，讓研究者得以剖析、瞭解閱聽人思辨歷程？

在後現代媒介情境之下，閱聽人研究面臨來自二方面的困境，一方面是媒介景象的劇變，文本不再具有統一的意識形態或明確的符號意義系統，媒介影像的激增，更讓全球社會沈浸瀰漫於媒介影像的洪流之中，形成「人人都是閱聽人」的景況，擴散閱聽人成為所有閱聽人存在的背景。另一方面，閱聽人研究典範在面臨破碎的後期資本主義社會情境，轉向強調消費文化對於閱聽行為的影響，伯名罕文化研究中心帶入閱聽人研究的批判意識，逐漸消退，閱聽人的抗拒力量逐漸消融於觀展/顧影自憐循環的展演行為。

對於前者，本研究試圖以「循環文本」的概念來強調文本與閱聽人間的交會融合，指出任何一個文本或媒介影像，都處於不斷循環的接收關係，閱聽人是穿梭於眾多文本間，不斷進行製碼與解碼的工作（詳細分析請見第三章）。對於後者，本研究藉由鄂蘭的哲學思考，試圖重新找回逐漸消退的批判意識，並倚重其提出的共同體意識、普遍可溝通性、想像性巡訪、無所依傍且無家感的思考狀態等概念，進行實際經驗資料的檢閱分析，初步觀察結果已呈現於第五章。於此，本研究試圖連結第五章各節分析的結果，以下列圖十八：閱聽人思辨歷程圖 呈現。

圖十八：閱聽人思辨歷程圖



說明：實線代表閱聽人進行思辨採取之途徑，虛線則代表閱聽人喪失思辨能力的狀態。

上圖為本研究根據鄂蘭哲學體系框架，實際觀察經驗資料並予以分析後綜合推論之結果。本研究特別說明所有線條均無箭頭方向，因為閱聽人的思辨屬於流動狀態，人們的思考隨著生命歷程與生活經驗不斷改變，位於思考沙洲狀態的閱聽人可能經過時間的累積而走向多元立足點的想像式巡訪，而曾保持無家感思考狀態的閱聽人亦可能過於沈醉入自我意識而喪失普遍可溝通性，於此，本研究認為所有線條途徑均是二端開放的狀態，閱聽人是於不同的思辨狀態之下流動、變化。

研究首先發現，想像操作的機制是所有閱聽人進行思辨的起點。閱聽人撰寫循環文本時，首先將現象世界紛亂的人生經驗與初步閱讀村上作品的感受加以沈澱，讓自己經由回溯思考喚起已除去直接感官刺激、儲存於心靈的影像，重新加以轉換為思考客體。此儲存於心靈之影像來源與轉換過程分為三種<sup>1</sup>，其一是以閱聽人本身生活經驗為主，經由村上作品的閱讀刺激後，重新喚回已經遺忘的記憶影像，並賦予該影像新的意義，此即為第一種想像操作機制。其二是閱聽人試圖將村上作品的世界框架加諸於自己日常生活經

<sup>1</sup> 三種想像操作機制的詳細討論，請參考第五章第一節。

驗，使二者重疊融合，試圖以村上文本世界作為觀看現實世界的濾鏡，用以解決日常生活面臨之問題，此即為第二種想像操作機制。其三則是以閱聽人本身的迷群經驗為思考的主要客體，閱聽人藉由回溯自己成為迷群的經過與迷群行為，重新思索迷群身分所代表的生命意義，此即為第三種想像操作機制。閱聽人透過上述三種想像操作的機制，將自己的人生經驗（包括閱讀村上作品的經驗）轉換為思考客體，以做進一步進行思辨的準備。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想像操作機制過程中，循環文本的線上撰寫方式，會影響其「去知覺化」的步驟。同步性傳輸的線上文本撰寫，由於時間與精神的限制，「去知覺化」的過程較低，閱聽人容易出現片段推論與情緒性用詞的傾向；非同步傳輸的線上文本撰寫，則因閱聽人是在閒暇時間於自己熟悉的撰寫環境之下書寫而成，因此出現較多完整的論理推論，亦較無情緒性辭彙傾向。此種結果顯示，「去知覺化」步驟會影響閱聽人處理思考客體的態度，而「去知覺化」步驟又與循環文本的撰寫環境有關，因此，若欲將網際空間建構為適合閱聽人展現思辨能力的場域，必須注意營造適合閱聽人去除過多紛雜混亂的情緒干擾之情境。

循環文本撰寫時的想像操作機制運作，是閱聽人孤獨的內心操作過程，人們透過此「無聲的自我對話」（引自 Arendt, 1978a: 74）讓自己沈浸於追求意義的心靈活動，然而，循環文本的發表是一種向外追求說服他人、追求他人共同體意識的認同。因此，閱聽人必須試圖將自己思考的結果向他人展現，以他人得以理解的話語說出，人們必須藉由他人的反照與協助才得以成為思考的主體，唯有如此，原本屬於私人品味的任意決定，才能走出純粹主觀的自我偏好，透過溝通與說服，達到美學判斷的公共性存在（參考自 Arendt, 1982b）。

據此，體現共同體意識的普遍可溝通性，成為進入想像操作機制後的第一道關卡，閱聽人必須展開溝通的誠意，闡述自己的思考結果，向他人展開說服。於研究過程中，本研究發現二種喪失普遍可溝通性的文本類型。其一，本研究稱之為「思考沙洲」，用以指稱未能清楚溝通並傳達思考結果的循環文本。停滯於思考沙洲的原因，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原因，是閱聽人因其

思考結果過於薄弱、模糊，雖然試圖將自己的感受傳達給他人，但卻無法清楚表達其核心意涵，如第一類與第二類的思考沙洲<sup>2</sup>。第二種陷入思考沙洲的原因，是閱聽人不欲向他人闡述或解釋其思考結果，他們將閱讀品味的判斷歸於純粹主觀認定、無須解釋，其本身即是放棄共同體意識的追求，使其循環文本經常陷入村上式語法的迷魂陣中，例如第三類思考沙洲。第三種陷入思考沙洲的原因，在於循環文本存在過多的空洞暗示，使得相互參照的跳躍頻繁，閱聽人本身的話語成為曖昧模糊的連結，例如第四種思考沙洲。

第二種喪失普遍可溝通性的文本類型，本研究以「村上失語症」稱之，意指閱聽人過於沈溺在村上文本世界，因完全融入文本情境而喪失說話的能力，只能如鸚鵡學舌般重複使用村上的話語。村上失語症類型的文本，經常引用某個村上作品人物、典故或情節作為暗語，藉由眾多村上暗語置換、重新組合而形成循環文本，然而，快速且片段的拼貼，使得閱聽人所欲陳述的意涵消失在複雜交錯的村上暗語謎團。

若循環文本已具備普遍可溝通性的要求之後，下一階段的思辨要求便是想像式巡訪歷程。無法擴大心胸、進行想像式巡訪之閱聽人，只能停留在單一立足點思考，他們呈現出二種傾向，首先是強烈的情緒訴求，反村上迷群將循環文本的發表視為私我判斷的情緒抒發管道，村上迷群則是陷溺於「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悲觀宿命觀點；再者，無論是村上迷群或反村上迷群，都同樣具有清楚的敵我意識，他們以「村上作品」為區分人群的標準，反村上迷群認為村上迷群是身心不平衡或見識不夠廣闊的幼稚高中生，而村上迷群則自認為是遺世獨立的孤獨思想家，濁濁塵世之俗人（非村上迷群）無法瞭解他們內心的感傷與孤寂。

閱聽人若能採取多元立足點的思考，想像式巡訪他人觀點，其循環文本則出現下列四個特徵：1.他們並不會永遠保持在村上迷群或反村上迷群的任何一方，而是遊走於各個立足點；2.他們不會概化所有村上作品，而是試圖分殊化個別作品的意義；3.他們會隨著自我人生經驗的演變，不斷與自我對

---

<sup>2</sup> 四類思考沙洲的詳細討論，請參考第五章第二節。

話，展開自我摧毀的思考歷程；4.在進行判斷之時，他們會試圖保持自我同一性的反身性思考。

此外，鄂蘭認為，思辨過程應放棄所有既定的道德體系，不輕易接受任何傳統或威權體制給予的價值系統。鄂蘭在分析艾契曼大審時指出，當時時代的氛圍使得道德喪失穩固的根基，形成一種隨時可以替換的風俗習慣，人們不再懷疑社會所普遍接受的道德觀念，人們可以輕易拋棄原來的道德觀念而接受納粹提倡的另一套價值系統，鄂蘭說「這些人，只要是道德標準是社會上所能夠接受的，從未去想過去懷疑這些他人之前所曾被教導去相信的東西。」(Arendt, 1994:744)。因此，隨波逐流、任意接受來自他人傳統威權價值者，容易成為無思考能力者(thoughtless)。因此，她要求思考中的人們應保持在無家感的狀態，不斷讓自己質疑所有理所當然的默識、甚或先前存在於閱聽人自我腦海的思考結果或判斷準則。

本研究發現，無法保持無家感之村上迷群，經常臣服於村上偶像魅力，模仿村上文本世界的生活，追尋村上虛構世界的飲食起居、談話方式、消費品味與閱讀習慣，期待村上式愛情的降臨，將自己建構為村上主角人物的「影子」，成為積極與村上同化之人。然而，保持無家感思索之閱聽人，他們意識到村上對自己的影響力，反思自己的迷群行為、生活經驗與社會樣態，進而讓自己隨時處於如離開家鄉、漂流異鄉的緊張、焦慮與不安之中。

最後，本研究發現，無論閱聽人是位於 圖十八：閱聽人思辨歷程圖 的任何位置，例如思考沙洲、村上失語症、採取單一立足點或與村上同化，都不是固定不變的狀態。相對的，閱聽人的思辨能力是隨著人生體驗、生命經驗或閱讀不同村上作品而改變，即便是落入思考沙洲或呈現村上失語症徵兆之閱聽人，可能在不斷撰寫循環文本或與他人溝通等經驗累積，而重新獲取普遍可溝通性的能力，而採取單一立足點或試圖與村上同化之村上迷群（閱聽人素養普遍較低），亦可能因歲月增長而累積較深的閱聽人素養，而能展現多元想像式巡訪的無家感思考。因此，閱聽人的思辨歷程，並不是憑單一循環文本便可永久決定閱聽人思辨能力的狀態，猶如循環文本強調不斷流動循環的接收分析關係一樣，閱聽人的思辨能力亦是處於非固定的變動狀

態，是可隨著循環文本的累積發表而邁向不同的方向前進。

根據上述的討論，本研究認為鄂蘭的哲學體系，確實可為閱聽人研究開啟另一套不同於接收分析典範之觀察閱聽人思辯能力的方式。鄂蘭強調的思考過程重於結果、無家感思考狀態、普遍可溝通性、多元想像式巡訪歷程等概念，可適度彌補本研究於第一章提出之閱聽人研究現存之問題。下一節，本研究根據運用鄂蘭哲學思考對於閱聽人思辨狀態的觀察結果，進一步與傳統閱聽人研究展開對話，並試圖結合二者，共同找尋閱聽人研究的未來方向。

## 第二節 重新思索閱聽人研究取向

本節將針對閱聽人研究取向，提出三點感想與建議。第一，本研究認為應將「閱聽人」概念回歸到作為「人」之基礎的混雜多元認同角色，此種觀點造成二方面的影響，一方面，閱聽人研究強調的閱聽人反身性思考不只是發生在閱聽人對於閱聽行為的反思，更發生在其對於人生道德價值體系的反思，另一方面，此種觀點亦使得閱聽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的權力關係，開始變化與流動。

第二，閱聽人思辨過程時，其抗拒解構的對象不只是媒介文本蘊藏的意識形態，尚且包括長期自我人生經驗形成的默識與價值體系，因此，閱聽人思辨能力的呈現是綿延不斷的自我摧毀過程，是無所依傍與無家感心靈狀態的保持，唯有藉由闡述自我思考結果、與他人辯駁溝通的過程等持續自我鍛鍊的過程，才得以培育養成。

第三，本研究發現，詮釋社群與共同體意識分別代表集體認同之純化與寬鬆二個力量，網路迷群若是過於強調詮釋社群之純化集體認同符號，將造成共同體意識的低落，進而喪失普遍可溝通性的能力。

接下來，本研究將針對上述三個觀點，分別論述之。

### 壹、重新思索「閱聽人」概念

傳統閱聽人研究，均將研究對象鎖定於「普羅大眾」階級，無論是 Morley(1980)《全國觀眾》、Radway(1987)羅曼史研究或 Ang(1985)的肥皂劇研究，研究者均站在以知識份子的角度，試圖瞭解平民百姓（或稱「俗民」）如何理解、接收或抗拒代表主流意識形態的媒介文本內容。此種做法容易陷入「菁英份子 vs. 普羅大眾」、「接受主流意識形態 vs. 抗拒主流意識形態」或「文本 vs. 閱聽人」之二元對立的桎梏，將原本混雜、不斷流動變化、異質性的閱聽人認同身分，視為單一、純粹、同質性高的閱聽人群體，忽略閱聽人本身存在著複雜認同變換。

因此，本研究以相對概念來指稱閱聽人，將閱聽人視為相應於文本而生，凡是直接或間接閱讀某個文本影像之人，都視為具有閱聽人之身分角色。因此，無論人們於現實生活的其他認同身分是男是女（性別認同），是父親、母親、兒子、女兒（家庭角色），是藍領階級或白領階級（工作階級），是學生、上班族或退休者（生命歷程）...，只要翻開小說、坐在電視機前面或是進入電影院，閱聽人身分即便浮現，而其他身分認同的角色穿插出現、交替影響人們於閱聽人身分時對於媒介影像的解讀、瞭解與意義生產。

再者，閱聽人於網際空間建立之線上身分，即便多數無法有效判斷其真實世界之線下身分的狀態，但少數得以辨別之線下身分者，卻也呈現出多元紛雜的傾向。如同第三章第二節對於閱聽人線上身分與線下身分的分析統計，416個線上身分之中，375個線上身分無法確定其真實世界的線下身分，而其中可判定其線下身分之閱聽人，雖然只有31位，但也呈現出多元的身分位置，包括譯者、文化評論者、美食家、音樂工作者、教授學者、專業或業餘作家、學生等，他們的身分位階不一，同時包含知識份子與普羅大眾。

因此，本研究認為相應於村上文本而生的閱聽人，不管其於真實世界扮演的職業角色或社經地位，只要曾經拿起村上作品閱讀，村上文本就已經向他們開展(perform)，因此，他們皆可視為環繞在村上作品形成的閱聽人。此種做法，不只是因為來自於網際空間的研究對象讓研究者無法判別其真實世界的線下身分，更重要的是，將閱聽人的身分回歸到基本「人」的本質，承認其多元、混雜、糾結、交錯的身分認同位置。

此種承認閱聽人多元認同身分的做法，產生二方面的影響。第一，是關於閱聽人反身性(reflexivity)思考的影響。Hoijer(1999)、Morley(1999)與Alassutari(1999)同時提出，閱聽人於接收分析典範之後的新典範發展趨勢，首重閱聽人的反身性思考，他們認為閱聽人對於「自己身為閱聽人」的事實會影響其對閱聽行為的評判，例如認為看報紙比看電視高尚，看電視新聞又比連續劇更具正當性等，閱聽人已經對於自己的閱聽行為道德階層(moral hierarchy)的判斷。



本研究於經驗研究資料整理發現，閱聽人的反身性思考，不只是發生於其位於閱聽人身份位置之時，他們同時會以自己非閱聽人位置的身份觀點，進而詮釋自己閱聽行為的展現，例如賴明珠所言：

正如每個讀者對村上的作品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體會、不同的喜愛程度一樣，每個譯者首先也不過是這眾多讀者中的一個而已。（賴明珠，編號 38）

即便是號稱「台灣村上春樹代言人」的專業譯者賴明珠，當其以讀者身份解讀村上作品時，亦與一般讀者一樣，會對於不同的村上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喜愛或感受；放下專業，她也曾有過如同一般讀者一樣的感動與偏好。此時，閱聽人位置勝於其非閱聽人位置的思考，專業者（非閱聽人解讀位置）體會到非專業者（閱聽人解讀位置）的閱讀感受。反過來說，非閱聽人位置亦可能介入閱聽人位置的思考，例如小說家徐錦成則說：

做為你（指村上）的同行，對這本書，我是有點嫉妒的。我嫉妒的倒不（全然）是它在世俗上的一鳴驚人，而是它的機智、深情，以及不可多得的原創性。（徐錦成，編號 123）

此時，徐錦成的非閱聽人位置（小說家），即介入其以閱聽人位置（讀者）對於村上作品的解讀與評判。因此，閱聽人不只是在站在閱聽人位置對於自己的閱聽行為進行反身性思考，他們是不斷跳躍於不同的身份認同位置之間，反覆思索文本意義與其對自身的影響。

無論如何，本研究認為 Hoijer(1999)、Morley(1999)與 Alasutari(1999)等人提出的閱聽人反身性思考，是開啟閱聽人思辨的重要起點。如同第五張第一節之分析指出，閱聽人經常將自己的閱聽行為經驗轉換為思考客體，並對此展開思辨與評判，第三種想像操作的機制，便是村上迷群將自己的迷群經驗視為思考客體，展開反身性的思考。然而，若以鄂蘭思考體系來看，並不是所有針對自己閱聽行為展開反身性思考之閱聽人，都展現出豐富的思辨能力；本研究發現，進入想像操作的機制不過是開始思辨旅程的起點，許多村上迷群都曾回頭思索自己成為迷群的經驗與心路歷程，如米多利（編號

171) 林俊安 (編號 178) Sunny (編號 179) 小碧 (編號 181) 阿樂 (編號 184) Maitri (編號 187) Joyce (編號 188) Sandy (編號 189) 江詩宏 (編號 190) 小愛 (編號 194) 蛋糕丸子 (編號 199) E-Philby.com (編號 214) E-Leven.cat (編號 220) Emma Lai (編號 383) ....等，但是只有少數迷群能夠保持無家感思考傾向，不將自己的迷群行為視為理所當然，從而反思村上對其自身的影響，重新找尋自己的認同位置與未來方向<sup>3</sup>。

承認閱聽人多元認同身份角色的第二個影響，是使得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權力關係，產生變化。閱聽人研究自從第二代接收分析開始，引進來自人類學的民俗誌研究方法，原始人類學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經常從在於「殖民母國研究者 vs. 殖民地人民」的關係，研究場域亦經常以非洲、印尼等未開發領域之原住民，使得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隱含著上對下或高對低的關係。然而，謝國雄(1997)以企業家為研究對象時，即發現此種上對下的研究關係已經被翻轉過來，而翁秀琪(2000)以女報人為研究對象時，更進一步以知識與社會階級作為區分標準，區分出八種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權力關係，呈現出多元複雜權力運作樣態。

本研究以閱聽人為研究對象，於研究過程亦發現，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權力關係是複雜且流動的。相對於翁秀琪(2000)以知識與社會階級作為區分準則，本研究則發現「素養」較適用於網際空間的研究領域，一方面，由於來自網際空間的研究文本，使得閱聽人實際世界的社會階級成為難以判斷辨別的項目，社會階級的影響已經消融於文字話語之中，轉換為資訊的形式呈現，另一方面，此種以資訊形式出現的知識基礎，是閱聽人於日常生活長期累積的結果，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展現於循環文本之中，因此本研究以「素養」稱之。因此，本研究修改自翁秀琪(2000)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圖」，將二者之間的關係以下圖呈現：

---

<sup>3</sup> 關於無家感思考狀態的討論，請參考第五章第四節。

圖十九：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權力關係圖

	研究者素養高	研究者素養低
研究對象素養高	I	II
研究對象素養低	III	IV

當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素養均高時，二者的權力關係位於第一象限；研究者素養低，而研究對象素養高時，位於第二象限；研究者素養高，而研究對象素養低，位於第三象限，研究者素養與研究對象素養均低時，則位於第四象限。第一象限與第四象限的權力關係是對等的，而第二象限與第三象限的權力關係則是不相等的。

傳統閱聽人研究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權力關係，較少出現於第二象限與第四象限，因研究者的知識份子角色，鮮少發生研究者素養較低的情況出現。但是，本研究發現，由於素養的組成成份與因素複雜，猶如閱聽人素養是由迷群素養、美學素養與智識素養共同組成，因此，研究者所具備的素養不一定均高於研究對象。如前所述，閱聽人來自四邊八方，閱聽人角色位置只不過是其眾多身份認同位置之一，他們可能於各自專業領域具有不同的知識、累積不同的素養。以語言素養為例，熟稔日文之閱聽人如賴明珠、李友中、銀色快手（編號 14）或小魚（編號 201）等，即比不諳日文之研究者，具備更多的語言素養；再以以音樂素養為例，喜好且精通爵士樂之閱聽人如朱中愷（編號 160、166、167） 歆儀（編號 161） Join（編號 162-165）等，亦比不熟悉爵士樂之研究者，具備較深之音樂素養。

再者，由素養所形成的權力關係，並不是固定不動的關係，而是隨著不同的素養而相互競爭、變化，例如討論音樂相關議題時，具有深度音樂素養之閱聽人擁有較高的權力關係，但是此權力關係並不一定同樣存在於村上作品意義的討論。換言之，面對不同的討論議題，產生不同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權力關係，而此權力關係是流動且變化不一的。

本研究在面對此種研究對象的素養深度與知識權力經常高於研究者的現象時，所採取的研究態度是試圖與此權力關係斷裂，將焦點回歸「理論關

懷」的研究層次。如同謝國雄(1997)所說，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心之所繫」不同，研究者關心的是知識理論的啟發，而研究對象則是試圖從循環文本的撰寫去挖掘自己的生命意義，因此，即便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經常因不同素養而存在著不同的權力關係，但是於理論關懷層次上，本研究則嘗試與此權力關係斷裂，經由蒐集與比較不同閱聽人思辨能力的呈現，重新建構研究對象。

## 貳、對於閱聽人研究的啟發

第一章第四節關於文本與優勢意義的討論中，本研究曾經提出接收分析典範最大問題點之一，在於預設文本具有一個統一的意義結構，而此意義結構等同於主流意識形態，因此接收分析典範認為閱聽人若能解構(retotalize)文本的優勢意義，重新建構自我的意義系統來對抗主流意識形態，此種解讀立場便是代表抗拒行為的對抗性符碼位置。然而，本研究對此提出三點反駁，首先，文本的優勢意義不一定等同於主流意識形態，一些非主流媒體或反公共領域論談的文本，經常與主流意識形態立場相對而立。第二，並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具有清晰統一的優勢意義，文本的意涵經常是多元、粉碎、矛盾、曖昧甚或彼此衝突。第三，若將研究者位置納入研究討論論述，將可以發現文本優勢意義的找尋是建立在研究者預設的框架與立足點，文本的優勢意義會隨著不同的研究框架而有所不同。

因此，若是文本的優勢意義不再成為瞭解閱聽人批判思考能力的起點，那麼研究者將從何評判閱聽人的思辨過程？難道，文本不再對意義的解讀產生影響？閱聽人是任意穿梭於破碎的文本中，完全依靠自我意識建立意義？

此種提問方式，其實是再一次落入文本與閱聽人的二元對立桎梏之中。首先，任何一個文本對於閱聽人而言，都是具有或多或少的循環文本特質，於此媒介影像到處充斥的資訊社會，閱聽人無時不刻地直接或間接接收媒介影像，因此，意義的生成是落入不斷接收循環之中，研究者若堅持找尋文本先決（如文本中心論）或閱聽人先決（如閱聽人中心論）的選擇，猶如追著自己尾巴的狗一樣，落入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套套問題迷陣。

再者，本研究發現，文本並不是不再對於意義生成產生影響，而是它的影響方式是間接、暗示、線索式地影響閱聽人的意義解讀，它是於模糊的意義世界給予導引的線索，閱聽人成為接收此線索，成為終極意義賦予的角色。村上文本所組成的村上世界，充滿作者村上遺留下的暗示與線索，例如詳細商品目錄般的物質符號描述、從未解決的迷宮似謎團中心、大量引自它文（如其他文學作家與作品或音樂章節與演奏者特徵等）的互文關係等，這些線索之間的關係是破碎的、非統合的、紛雜混亂的，閱聽人拾起這些線索，自行串連、整理、歸納並追尋挖掘其中隱藏的意義；於此，閱聽人扮演起最後統合意義生成的角色，他/她原本破碎、矛盾、紛雜的文本，重新獲得統一的意義。

因此，閱聽人的思辨起點，在於其自身對於文本所進行的意義詮釋，如同村上所說的：

我的中國只不過是為我而存在的中國。或者是我本身。那也是我自己的紐約、我自己的彼得堡、我自己的地球、我自己的宇宙。地球儀上黃色的中國。今後我可能不會去那個地方。那不是為我而存在的中國。我也不會去紐約或彼得堡。那也不是為我而存在的地方。--《開往中國的慢船》，p.41。

閱聽人的村上世界，是存在於閱聽人的心目之中；現實生活中由村上文字所組成的村上世界，是混雜而破碎的，是由閱聽人自己負起意義賦予的工作，因此，意義是環繞在閱聽人自我意識之下建構而成。

因此，閱聽人的思辨對象，是自我建構出的意義體系；閱聽人抗拒的對象，亦是來自自我內心結合生活經驗與閱讀感知所形成的思考客體。如同本研究第五張第一節對於想像操作機制的討論一樣，無論是閱聽人藉由閱讀村上作品喚回自身經驗（第一種想像操作機制），或是融合生活經驗與村上作品閱讀交相形成思考客體（第二種想像操作機制），甚或回頭檢視自己的迷群經驗，將之視為思考對象（第三種想像操作機制），閱聽人的思考客體均是來自於自我本身的心靈生活。因此，若去除研究者對研究文本優勢意義賦予的研究干涉，將文本優勢意義的賦予交給閱聽人本身，將可以發現霍爾提

出的三種解讀立場，無論是主流霸權位置的順從對象、協商性符碼位置所接受的霸權定義或是對抗性符碼位置所拆解的優勢意義，都是來自於閱聽人自我串連文本線索所建構出來的意義體系。

意義的生產，是閱聽人接收文本遺留之線索，重新串連、組織與詮釋而成，閱聽人抗拒的對象不再是代表主流意識形態的優勢意義，而是閱聽人自我建構出的認知意義，人們將此認知意義透過想像操作的機制轉換為思考客體，開始思辨的旅程。在思辨的旅程之中，人們應試圖讓自己進行想像式巡訪多元立足觀點，並保持於無家感的思考狀態，此種做法，對於閱聽人研究帶來三種啟發。

第一，將閱聽人的批判思考，視為是綿延不斷的思辨歷程，而非單一時間點對某個節目或文本內容的理解或感想，而是人們對於自我生命意義的永恆追尋。

鄂蘭認為，心靈活動是沒有終止的時候，每個思考的結果，都可能在下一刻思辨過程中被推翻(Arendt, 1978a)。我們可以據此來思考接收分析典範對於三種解讀立場的選擇，如第一章第三節所述，接收分析典範強調閱聽人必須能夠拆解文本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重新賦予文本解讀框架，也就是採取對抗性閱讀位置時，才是具有思辨能力之批判閱聽人；假如閱聽人接收文本優勢意義、採取主流霸權位置解讀，或閱聽人遊走於主流/在地情境之間、採取協商性符碼位置，便是無法抗拒文本主流意識形態，是不具有思辨能力之閱聽人。此種分析取向，試圖與某一時刻之思考結果來判斷閱聽人是否具有思辨能力，無法考慮到思考之自我拆解傾向。

思考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並沒有一個最終的結果，某一時刻的結論必將繼續成為下一刻思考的對象，所以，這種不斷自我拆解的過程使得思考具有自我摧毀的傾向。因此，以接收分析典範的模式而言，即便是閱聽人在某個時刻採取主流霸權位置來解讀文本，只要閱聽人具有思辨能力，這個解讀位置本身將成為閱聽人下一刻進行思考的對象。比如說，人們在看《麻雀

變鳳凰》<sup>4</sup>一片時，即便是因為認同該片所呈現出好萊塢資本主義模式下的父權戀愛制度而產生幻想、感到滿足，也就是採取主流霸權之解讀位置，只要閱聽人能夠針對「採取這個閱讀位置」的事實，透過回溯思考來進行思辨，回頭想想自己「為何感動、對什麼感動、這種感動是否存在著什麼迷思」……等，此種思考的過程亦展現試圖巡訪先前未注意之其他立足點，而非讓自己安於受文本統治洗禮的主流霸權位置，亦即實現無家感的思考傾向。

相較於接收分析典範將焦點放在「關鍵時刻」，本研究將閱聽人的思考視為綿延不斷的歷程之研究取向，強調閱聽人會隨著自己的生命經驗成長而對媒介文本產生不同的解讀取向與意義獲取。霍爾(1980)提出提出意義產生於文本與閱聽人接觸的「關鍵時刻」，目的在於強調意義是由文本與閱聽人共同賦予，而非由文本或閱聽人單方決定。霍爾的「關鍵時刻」概念，對於當時傳播研究的環境具有突破性影響，一方面，他拒絕文本中心論的觀點(如效果研究)，因為純粹以文本結構框架為研究中心而忽略閱聽人之解讀，另一方面，他也拒絕閱聽人中心論的觀點(如使用與滿足理論)，因為純粹關注閱聽對於文本之解讀而忽略文本隱藏的意識形態。

接收分析典範接續霍爾的觀點，對於關鍵時刻所採取的研究方法粗分為二種：一種是閱聽人回應分析或深度訪談，於事後訪談閱聽人對於文本之看法，如 Ang(1985)<sup>5</sup>以閱聽人的廣告回函為分析樣本，或林芳玫(1996)對閱聽人進行之深度訪談。另一研究方法為民族誌法，關注閱聽行為產生的情境，試圖進入閱聽行為產製之當時，如 Morley(1995)試圖進入觀看電視的家庭。對於前者，研究者試圖從閱聽人於閱聽行為進行之後的自我陳述來瞭解意義的產生，而後者則是試圖瞭解閱聽人直接接觸媒介文本當時的解讀狀態(例

---

<sup>4</sup> 《麻雀變鳳凰》(Pretty Woman)可以視為美國好萊塢商業電影代表。1990年出品，於當時造成轟動全球的票房魅力，是由蓋瑞馬歇爾(Gary Marshall)導演，李察吉爾(Richard Gere)與茱莉亞羅勃茲(Julia Roberts)主演，劇情描述闊商人李察吉爾到洛杉磯出遊，與阻街女郎茱莉亞羅勃茲邂逅的過程。吉爾將庸俗不堪的醜小鴨茱莉亞改造為高貴氣質的富家女形象，兩人最後過著「公主與王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sup>5</sup> 請參考第一章註 15。

如家庭之權力分配對於閱聽行為的影響)。二者均欲還原關鍵時刻之文本與閱聽人共同對於意義產生的影響。

然而，本研究發現，無論是當下觀察或事後訪談，二者均以單一時間點作為關鍵時刻的觀察；但是，閱聽人的思辨過程是跟隨其生命歷程、素養累積、經驗體驗而有所不同。村上作品自 1986 年進入台灣，迄今已邁入第十七年的歲月，許多從青少年時期接觸村上作品之閱聽人，也隨之邁向中壯年時期。對於同樣的村上文本，閱聽人於不同時期經常有不同的體驗與感受，不同的人生經驗亦交替影響其對於村上作品的詮釋與批評；再者，村上作品仍在持續增加，文風與主題觀點仍在變化。因此，本研究認為，閱聽人研究必須將閱聽人的思辨能力視為流動變化的時間歷程，單一時間點的觀察並不足以為判斷依據。

第二，相對於接收分析的抗拒觀點，本研究認為思辨能力是一種心靈狀態，是閱聽人對待生命或追求意義所展現之不斷自我質疑的持續態度，是鄂蘭所云之放棄所有依靠、讓自己保持於無家感的思考傾向。

接收分析典範的抗拒觀點，目的在於保留批判之精神，試圖瞭解閱聽人如何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洗禮。社會是一場關於關於真實框架鬥爭的場域，傳播媒介的力量在於推行一套定義、保護、散佈並且保護社會主流價值的意識形態。原始現象世界的社會，是充滿矛盾與混亂的衝突事件，媒介對於社會世界的重新詮釋與定義，提供人們簡單且直接的的框架，讓意義得以固定。有鑑於媒介對於真實框架的力量，接收分析典範提出抗拒的觀點，找尋閱聽人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方法。

然而，當代社會卻是存在於非常混雜曖昧的狀況，一方面，當代社會中已不存在著統一的意識形態，媒介訊息經常是充滿自我矛盾與破碎的主體 (Murphy, 1999)，閱聽人原本明確的抗拒對象已經消失；但另一方面，此種狀態並不表示閱聽人都將成為納賽西斯(Narcissus)<sup>6</sup>，只能沈溺於觀展/顧影自

---

<sup>6</sup> 參考第一章第三節註 20。



憐循環而喪失批判/思辨之精神。若將抗拒視為爭奪、拆解、對抗主流意識形態，鄂蘭提出的放棄所有依靠（即「無所依傍之思考」）的無家感思考傾向，便成為評判當代閱聽人思辨能力的重要判準。鄂蘭認為，這是一種「不需要依靠任何支柱、標準或傳統」的新思維方式，她說：

生活在歷經大屠殺之後的「黑暗時代」，西方宗教與世俗真理的樑柱都已經粉碎，我們彷彿站在滿地瘡痍的瓦礫堆中。這同時是危機，也是轉機……一種不須依靠任何支柱、標準或傳統的新思維方式得以誕生。（轉引自 Disch, 1996: 204）

此種放棄所有依靠、拋開傳統價值體系束縛、丟捨已成默識之知識基礎與分類架構的做法，即是鄂蘭所稱之無所依傍且保持於無家感狀態的思考特徵。以此觀看閱聽人的批判思辨能力，閱聽人不只應放棄接受媒介賦予的真實框架，更進一步，閱聽人尚且必須放棄原本之自我本身先前存在的價值系統或傳統默識之限制。換句話說，接收分析典範下之「抗拒」對象在於媒介文本所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而鄂蘭提出的「無所依傍之思考」所必須放棄之「依靠」(banisters, 欄杆)不只是媒介文本，也不只是主流意識形態，更包括存在於閱聽人本身、難以察覺之概念分類系統與善惡判斷準則。此種思考方式，是讓自己永遠保持在不斷質疑、憂慮、不安的無家感狀態。

第三，本研究發現，閱聽人思辨能力的養成，並無特定理論規則可循，只能於實踐過程中的不斷自我鍛鍊與反思，逐漸累積而成。此項觀點，與本研究採用鄂蘭對於心靈活動的本質認定有關。

鄂蘭認為人們心靈生活依循的判斷，與科學判斷不同。科學判斷是依循外在判斷的準則，存在著確切的科學證據或邏輯定律可依循，他們採取「斷言判斷」(determinant judgments)，從普遍律則與理論信念出發，將特殊具體事物歸納在這些理論律則之下。然而，常人的判斷卻是屬於「反思判斷」(reflective judgment)，從範例(example)出發，人們藉由實踐過程不斷觀看或經歷範例的洗禮，將這些範例視為判斷的「嬰兒學步車」(the go-cart of judgment)，是經由實踐過程一步一步鍛鍊而成，於此過程中，人們會保持個

別範例的特殊性，經由此特殊性察覺某些共同的普遍性，因此與預設普遍範疇的斷言判斷不同。(Arendt, 1982c)因此，鄂蘭認為人們的思考特質，並非與生俱來的，而是後天鍛鍊而成，她說：

思考並非固有的人類特殊本質。如亞里斯多德說，人是「說話的動物」(speaking animal)，人天生具有說話、表達溝通的能力；但人不是天生就是具有「思考的動物」(thinking animals)。(Arendt, 1978a: 88)

此種後天鍛鍊而來的思辨能力，並無法藉由他人的教導養成，因為思考並不存在著明確的「思考交戰手冊」或「思考步驟流程」，讓人們「不用思考」只要依循這些手冊原則或步驟，便可獲得思辨的能力。鄂蘭認為：

判斷是一種特殊的才能，它只能在實踐中獲得，無法從他人教導獲得....因此，不存在任何學校可以使它變得更好。(Arendt, 1982c: 84)

本研究認為循環文本可視為閱聽人思辨能力的鍛鍊，閱聽人藉由循環文本的撰寫過程，於內心不斷與自己對話，整理儲存於心靈生活的眾多影像，例如人生體驗、生活經驗或閱讀心得等，並且將之串連，追尋其意義所在，而循環文本的發表與展演，代表閱聽人邁出孤獨的自我內心世界，試圖於共同體意識的追求中，闡述其思考結果、說服他人與他人爭辯論證，藉著此種不斷與自己對話、與他人對話的過程，進行想像式巡訪，以增加思辨能力的累積。

### 參、詮釋社群、共同體意識與網路迷群

「社群 / 共同體」(community)的概念，同時貫穿來自閱聽人研究的詮釋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鄂蘭哲學體系的共同體意識(community sense)與網路文化討論的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或線上社群(online community)等本研究之主要文獻來源。但是本研究發現，不同來源的討論，指出「社群 / 共同體」的不同面向與焦點。

閱聽人研究對於詮釋社群的討論，與 Anderson(1991)「想像共同體」(the

imagined community)的概念有關，Anderson(1991)認為大眾傳播媒介扮演起連結人群、傳遞想像關係的工作，藉由媒體的仲介，一群本來空間上分離的個體，卻因為共同看一份報紙，共同閱讀一本小說，或是共同參與同一事件的討論，進而產生時間上的共時性，形成一種新的、以媒介為外圍疆界的想像社群。Alassutari (1999)提出，閱聽人研究從第二代接收分析開始強調詮釋社群對於閱聽人日常生活詮釋媒介訊息的影響。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1998)則認為閱聽人藉由媒介提供的影像，跨越彼此之間時空障礙，經媒介影像視為是彼此共有的事物，而成為想像社群。

閱聽人研究對於詮釋社群概念的運用，強調人們經由媒介的仲介，將原本從未謀面、毫不相關的個人串連為詮釋社群，詮釋社群中的閱聽人是以媒介影像為共同基礎，例如村上迷群以村上文本作為共同基礎一般，此種基礎會發展出其特有媒介影響的詮釋方式。以集體認同的觀點而言，媒介影像成為我族共有的特徵，並以之區分他者的差別，身為詮釋社群之一的閱聽人將會以其特有的共同視野框架對於日常生活經驗進行詮釋。

另一方面，鄂蘭哲學體系對於「共同體意識」的討論，源自於康德提出之人們共同身為人類所共有的感覺，強調人們必須跨越彼此因個別主觀意識造成的差異與障礙，將私人品味判斷經由公開闡述與說服他人的過程，受到公共性檢驗而達到相互理解(Arendt, 1982b)。以集體認同的觀點而言，共同體意識並非如詮釋社群將焦點放在共有的特徵，共同體意識強調群體間的差異，以及共同體間人們試圖征服彼此差異而達到相互理解的努力。

因此，詮釋社群與共同體意識分別代表集體認同的二個方向運作：純化與寬鬆。石之瑜(1993)與林福岳(1998)皆曾提出，集體認同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必然會面臨集體邊界的兩難情境：是要純化集體內的共同性，排除邊緣的人士及團體；抑或不斷放寬邊界，以納入更多處於邊界之人士與團體？這二種無論何者，均會未集體帶來高度的焦慮與不安，因為如果採取前者，不斷純化集體符號，將會讓成員時時感到認同的壓力，並因和集體外的人劃清界線而亦加孤立；若採取後者，放寬界限，包容更多的邊緣集體，又會讓集體認同日益模糊，威脅集體認同的核心主張。因此，核心團體的成員

必須在不斷純化與寬鬆間進行抉擇，選擇純化將塑造更多的敵視團體，選擇寬鬆則會淡化基礎認同的標的。

閱聽人研究常用之詮釋社群的觀點，傾向於純化的方向，它試圖強調人們共同基礎所發展出來的詮釋視野與框架。鄂蘭哲學系統採用之共同體意識的觀點，則傾向於寬鬆的方向，它試圖強調不同人群應跨越彼此差異，放寬彼此界限而達到相互理解的程度。然而，本研究發現，網路迷群之集體符號的純化與寬鬆，影響閱聽人普遍可溝通性的程度，進而影響閱聽人思辨能力的展現，此種現象，明顯地出現在村上暗語的使用。

閱聽人於循環文本使用村上暗語，作為詮釋社群成員共同的集體符號，可以凸顯彼此間因迷群素養累積、基於村上作品而產生親密熟悉感。循環文本的撰寫者在製碼時取用片段村上用語或情節，去情境化後重組為村上暗語嵌入循環文本之中，有如謎題創作者，等待看過同樣村上作品之循環文本解碼者解開村上暗語形成的謎題，進而瞭解該循環文本的意涵。此種迷群間藉由循環文本所進行的猜謎遊戲，讓迷群因共同投身於遊戲間而感到共為一體的我族感，形成詮釋社群的純化過程。然而，當村上暗語過多、過多的情節與用語脫離原始村上情境後，重新組合成新的循環文本時，村上暗語之符號的所指(significant)與能指(signifie)<sup>7</sup>開始脫節，最後只剩下漂流空洞的能指相互堆積、串連，終究因喪失普遍可溝通性而造成村上失語症現象的產生。村上失語症現象的產生，也代表著網路迷群若是過於強調純化詮釋社群的集體符號，將會造成與社群外他者溝通問題的產生，使得社群成員因喪失普遍可溝通性，因而無法達到有效思辨能力的展現。

---

<sup>7</sup> 所指與能指的概念，來自德國語言學大師索緒爾(F. de Saussure)，索緒爾認為意義(signification)是由所指與能指共同組合而成，二者的關係既是必然的也是任意的。參考自 Saussure, F. de.(1996)。

### 第三節 研究檢討

本研究嘗試以鄂蘭的哲學思考體系，作為觀察瞭解閱聽人思辨能力之框架，並將研究執行場域設定於網際空間，因此，此種研究設計亦產生二方面的問題，第一，是關於鄂蘭哲學體系的適用性，起自於政治哲學領域的鄂蘭思想，運用至閱聽人研究，是否產生運用與詮釋上的困難？第二，以網際空間為研究場域，其介於真實與虛擬之間的「虛擬之地」(the virtual land)(Jordan, 1999)特質，如何影響研究的執行？本節將針對此二方面的問題，進一步討論。

#### 壹、鄂蘭哲學的適用性

鄂蘭的哲學思考，受到納粹迫害猶太人事件影響至深，她試圖從人的內心世界建構出一套思考與溝通系統，讓不同的種族人群可因與天俱來、彼此相互需要的社會性需求而相互尊重與和平共處。因此，鄂蘭認為人類基於共同存在於社會之共同體意識，必須向他人展現溝通誠意，試圖讓他人得以知曉自己的思考，讓自己的思考結果受到公共性的考驗。基於對於人性多元性特徵的尊重，即便無法完全瞭解他人的立場，也應勉力讓自己跨越己身觀點的侷限，試圖多方想像他人觀點。

基於此種觀點發展出來的閱聽人思辨判斷模式，強調普遍可溝通性的必要。因此本研究基本預設任何文本的撰寫，都應展現溝通誠意，盡力讓同為共同體的他者得以瞭解。據此，本研究歸納出「思考沙洲」與「村上失語症」二種因喪失普遍可溝通性而無法展現思辨能力的典型。

但就藝術創作而言，某些派別的創作目的是故意創造特殊溝通方式來表現其所欲表達的意涵。例如意識流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之長篇《尤利西斯》(Ulysses)，特意創造大斷內心獨白與跳躍式自由聯想，用來展現人們內心的心靈世界，使得整部小說晦澀難懂，尤其是最後其最後一章女主角結合自由聯想的內心獨白，總長二萬多字，皆是如泉湧而出、沒有間斷的獨白(參

考自鄭樹森，2002）。此種文字撰寫方式，以鄂蘭之思辨模式而言，即屬於沈浸於自我思考的象牙塔，並不試圖向他人展現普遍可溝通性的誠意。

再如現代主義創始者之一 Guy Debord，為破壞人們對於視覺符號理所當然的接受性，創作之實驗電影《薩德的尖叫》(Screaming for Sade)，在全長八十分鐘的影片中，有五分之四的時間螢幕全黑，Debord 以此凸顯人們受限於溝通語言之符碼（如視覺影像）產生的限制(參考自 Jay, 1994)。此種藝術創作方式，於現代藝術的創作作品之中層出不窮，此類作品創造的目的，是欲挑戰閱聽人潛藏於內心的思考慣例（例如 Guy Debord 的做法，可謂挑戰人們「眼見為憑」的習慣，讓人們體會視覺對人們認知的影響），它們並不直接訴說其所欲傳達的意義，而是輾轉讓人們自行進行詮釋。但是，以本研究的研究執行方式，此類作品將會被歸於不具普遍可溝通性的類型。

無論是喬伊斯或 Debord，他們進行藝術創作的目的，皆是在於放棄人們理所當然的普遍可溝通性之要求，喬伊斯藉由晦澀難懂的內心獨白，來凸顯人們內心混亂又獨特的意識狀態，Debord 則是希望直擊人們慣用的視覺符號，彰顯存在於溝通行為的仲介產物，他們不只是呈現「喪失」普遍可溝通性的要求，更進一步是主動要求「放棄」普遍可溝通性，以成就其藝術創作的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執行過程，亦曾遭遇某些循環文本的語言表達方式，難以直接進行研究分析。研究發現，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概念與架構，較適合用於一般直接訴說閱讀經驗或論述作品意義之循環文本，亦即直述式文章類型；非直述式文章類型，例如以詩或寓言形式發表之循環文本，本研究的觀念體系即難以適用。例如 Alan Huang(編號 360)以詩的形式來表達其對《地下鐵事件》的觀點，詩的形式本身充滿著許多斷裂與跳躍，讓讀者發揮聯想來填補縫隙、形成意義。再如海豚(編號 249)討論村上近作《人造衛星情人》時，並不直接說明心得或感覺，而是迂迴藉由眾多隱喻的交相累積，試圖讓他人從其隱喻文字輾轉揣測海豚所欲表達的意涵，她的陳述方式如下：

當你被閃電擊中的時候，我在想即使沒死，或許身體的某些部份已經隨著那道強烈的電流而被分解消散，於是就算以後會復原，但是有某些地方的土壤卻已經被翻鬆了，或者被風化的像白色的枯骨一樣，很難理解自己就慶（筆者：究竟）能描述些什麼，但是這是我現在所能書寫的。（海豚，編號 249）

再如本研究一開始即表明放棄納入研究樣本的「滾得太遠之循環文本」，許多「滾得太遠之循環文本」的陳述方式，是閱聽人另創一個寓言式故事來說明其對村上作品意義的詮釋。無論是 Alan Huang 的詩、海豚的隱喻或是「滾得太遠之循環文本」的寓言故事，他們創作時預留給讀者解讀的空間，造成研究執行時的困難。

若將循環文本，視為文學創作之一，本研究運用鄂蘭哲學體系發展出來的研究框架，並未能顧及某些特殊手法、特別用語、特殊表現方式象徵的「言外之意」。因此，雖然本研究因應媒介景象複雜趨勢發展，發展出循環文本概念以指稱文本與閱聽人融合交錯點，但卻承襲過往閱聽人研究的傳統，注重循環文本代表的閱聽人面向，視循環文本為閱聽人闡述自我思考結果的呈現，忽略其同時並存在的文本面向，無法兼顧以創作為目的之循環文本類型。無法運用至特殊藝術創作類型之文本分析，成為本研究運用鄂蘭哲學體系遭遇到的最大問題點所在。

另一個運用鄂蘭哲學產生的問題，存在於其理論觀點對於公私領域區分的掙扎。本研究發現，於經驗層次進行思考之閱聽人，經常模仿村上世界的物質生活方式，試圖現實世界與村上同化，並較常出現單一立足觀點的思考。但從另一角度來看，經驗描述層次思考之主題經常偏向於私領域層次，例如飲食習慣、衣著方式或生活傾向等，其目的在於私人品味的向外宣稱而非徵求他人公共性、相互主觀的認同。因此，產生論述主題傾向與理論觀點的矛盾：閱聽人用以抒發私人自我情感或意識之循環文本，是否仍然需要符合鄂蘭以公共性為主之品味判斷要求？換句話說，討論相關私領域主題之循環文本，是否需要符合鄂蘭對於公領域思辨的要求？究竟，閱聽品味是屬於毋需向他人訴說、解釋的私領域？亦或閱聽品味是人們追求彼此相互瞭解之

建立共同體意識的公領域？

由於本研究主要研究核心在於瞭解閱聽人的思辨能力，並將循環文本視為提升閱聽人思辨能力的思考鍛鍊，閱聽人可藉由循環文本的撰寫與發表來增進自我思辨的能力。因此，於本研究的預設立場之下，循環文本的書寫與發表，便無法僅停留在私領域藩籬之內。屬於私領域之自我情緒抒發或強調創作概念特質的循環文本，或許適用於其他美學判斷標準來加以衡量其美學價值，但本研究之基本預設將循環文本視為閱聽人思辨能力之鍛鍊，因此要求循環文本必須符合公領域思辨的要求。此點成為本研究基本預設形成之限制，本研究思考重點在於閱聽人思辨能力，亦造成未能顧及以抒發自我意識或創造美學價值之新創文本的評判。

## 貳、網路空間對於閱聽人研究的影響

Ruddock(2001)曾經提出，網路迷群經常自行生產物質產品(如錄影帶)，而此類物質產品正得以成為資源有限之研究者極佳的研究對象，因為網路迷群的產品，一方面代表著不受研究者干擾的自然產物，另一方面，它也代表著研究者可以不須藉由直接訪談、但可瞭解閱聽人意義生成的方式。

本研究發現，網路迷群於網路展演自己的產物(本研究稱之為循環文本)，確實如 Ruddock(2001)所言，對於經費資源有限之研究者，確實提供一個良好觀察閱聽人意義生成方式的良好窗口，它的優點包括：

第一，經費便宜。網際空間開放給任何具有基礎電腦通訊設備者，包括研究者與其他網路迷群。不同於 Morley(1980)採取的直接訪談、Ang(1985)於雜誌的廣告招募或林芳玫(1996)的深度訪談等，此種方式無須訪談費用，只需少數的上網費用即可。

第二，網路迷群的循環文本，是完全不受研究者干擾，而來自閱聽人自我意願之下的產物。相較於實驗法或調查法，雖然民俗誌研究法較為尊重閱聽人主體性；民族誌法基於自然發生的情境，強調日常生活與參與者的眼光，征服實驗法與調查法無法去除的人工感(artificiality)缺點(Ruddock, 2001:



127)；但無論是深度訪談或進入閱聽人家庭的觀察，仍然存在著研究者主導與干擾的問題。但是，網路迷群於網際空間發表的循環文本，卻可以提供一個讓研究者得以默默在旁、獨自觀察閱聽人意義生成的方式，將研究者的角色完全排除在循環文本的意義生成過程。

第三，龐大的網路空間讓眾多閱聽人可以同時進入，並保留其豐富的閱聽記錄。本研究觀察《村上春樹的網路森林》四年以來，共發現 416 個線上身份，1815 篇循環文本，此種龐大且豐富的資料庫，一方面，具有有量化研究其抽樣數量眾多之優點，但無其問卷結構性限制與調查內容重量不重質之缺點，另一方面，又具有質化研究可以獲取閱聽人較深層意義詮釋的討論，但排除其研究對象數量較少之缺點。再者，若網站經營者留下良好的記錄，研究者並可依序循環文本發表時間之先後順序，長期追蹤觀察同一閱聽人意義生成與思辨能力演變之過程；本研究觀察場域《村上春樹的網路森林》，九成以上之循環文本，均標明其發表日期。

相對於上述的優點，以網際空間作為研究場域，對於閱聽人研究而言，仍然存在著某些難以解決的缺點。本研究將從二方面來看。

第一，眾多網路研究者如 Watson(1998)、Poster(1999)、Jordan(1999)與 Baym(2000)等均曾提出，網際空間是非常複雜的領域，不同的通訊介面或系統如電子郵件信箱 (E-Mail)、電子公佈欄(B.B.S.)、新聞群組(newsgroup)、全球資訊網(WWW:World Wide Web)或網路閒聊系統(IRC: Internet Relay Chat)等，均存在不同的溝通方式，也據此對於傳播意義體系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若貿然將研究結果進行跨系統間的推論（如將對電子公佈欄的研究結果推論至全球資訊網），將產生嚴重的問題。

本研究雖然主要以位於全球資訊網且同步性傳輸的循環文本為主，但是少數轉載自其他留言版之同步性傳輸的循環文本，也凸顯出同步性傳輸與非同步性傳輸的溝通特性會影響閱聽人思辨能力的展現（詳細討論請見本章第一節）。因此，本研究強調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是一種「結晶化」(crystallized)的產物，眾多的研究因素如村上文本特徵的影響或以網際空間為研究場域

等，共同形成研究結果的產生，若試圖將本研究觀察結果運用至其他網站或進一步推論至其他網路文化，必須經過進一步謹慎的評估。如 Watson(1998)、Poster(1999)、Jordan(1999)與 Baym(2000)所言，網路媒介景象相當複雜，本研究認為若以本研究提出閱聽人素養作為建立線上身分之討論，運用至其他如網路連線遊戲如「泥巴」(MUDs: Multi-User Domain, Multi-User Dungeons)，將會產生相當大的推論謬誤。因此，本研究建議，對於網路媒介體系研究，進行跨系統間的推論，是需要非常小心謹慎的衡量評估。

第二，關於匿名性(anonymity)、虛擬化身(avatar)與線上身份轉換之間的問題。

網際空間最受人矚目的特性之一，是其匿名性(anonymity)。原本生活在現實世界的人們，具有活生生的軀體、聲音、容貌，背負著出生種族背景、性別、階級等特徵，全部消逝在虛擬空間。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 David Porter 提出：

存住在虛擬空間的多數人，都沒有身體、沒有臉、沒有歷史、沒有音調、沒有特徵、沒有手勢，也沒有擁抱。網路上只存在著脫離情境、缺乏明確辨認的字詞(words)，只存在陌生、如空氣般輕的領域。(Porter, 1997: XI)

許多網路文化研究者都不斷強調匿名性對於既定身分認同的解放功能。Zickmund(1998)提出網路匿名性式的互動，讓個人得以主動探索身體的不同面向、揭露並滿足其慾望，特別是提供非異性戀者實踐其性傾向而無須擔憂行動後果的領域。孫秀蕙(1998)認為網路匿名性對於身分敏感者的發言，具有正面效果。Turkle(1998)指出匿名性得以讓人們表露不為人知或壓抑的一面，玩弄自己的身分，嘗試扮演不同性格角色。Baym(2000)提出匿名性得以讓人隱藏個人身分，除去社會規範，發展另類認同

然而，網際空間的匿名性，藏匿並不是參與者的線上身分，而是參與者的身體實踐，匿名性造成的斷裂，是線上身分(online identity)與線下身分(offline identity)間的關係，而不是指線上世界的人們都是帶有相同面具、毫

無區辨可能的人群。居存於網際空間的人們，一樣具有辨別身分的方式，但其辨別方式與現實世界的方式不同，他們不再以種族、階級、性別、容貌、經濟地位等具體物質因素相互辨認，而是重新建構起另一套網際空間的區別系統。研究搖滾樂迷群網站的 Watson(1998)認為，雖然電腦仲介傳播提供較大的權力讓人們得以控制原本無法控制的特質，例如外表長相、種族或性別，但是「在網路的社會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匿名的(anonymous)」(p.111)，他指出其研究的 Phish.net 網站提供行為的足夠記錄(enough accountability of action)，使得張貼行為是以真實身分來進行。Baym(1998)提出，即便是透過匿名式的電腦仲介傳播溝通，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人們也將創造出穩定的線上身分。Jordan(1999)稱此過程為「重構階層」(renovated hierarchies)，意指線下階層重新在線上創造的過程，因為網際空間的資訊特性，使得身體得以被重寫、階層得以被重新創造，人們在線上世界重新創造出來的身分，稱為「虛擬化身」(avatar)。Jordan 對此說到：

網際空間的人們並不是完全難以辨識的(anonymous)，難以辨識的是他們真實世界的身分。然而，線上與線下身份的關係不一定是完全分離，不同的網路資源<sup>8</sup>創造出不同的線上與線下關係。線上與線下關係雖然是不斷延伸且脆弱易斷的，但是線上虛擬化身並不應被視為與線下身份完全無關。...但無論如何，當我們面對螢幕時，我們無法完全撇開年紀、經驗、性別、種族等身份認同，這只有實驗室中才可能完全撇開。因此，所有的虛擬化身都是覆蓋在既存的身份認同上。(Jordan, 1999:75-77)

當人們在線上世界發展出穩定的人格，他人可以藉由此穩定的人格來進行辨識時，此穩定的人格即是「虛擬化身」。此虛擬化身建立人格的方式雖然與線下世界的身分認同並不同，缺乏物質身體特徵可作指標，但並不是毫無關係，而是存在著複雜的關係連結。Jordan(1999)提出，穩定的虛擬化身必須有穩定的姓名與風格，雖然人們會企圖將自己的風格建立成自我所欲

---

<sup>8</sup> Jordan(1999)強調，不同的網路世界如電子布告欄、電子郵件信箱、全球資訊網、「泥巴」或新聞群組等，其個人擁有建立自我虛擬化身的資源，是大不相同的。

的方式，但風格的確立與否必須由他人認定，如果他人無法認識或確立其風格，那麼此虛擬化身的風格即不成立。

許多電腦仲介溝通的研究者在研究不同的網際空間時，對於虛擬化身的風格與重構階層之間的關係，提出不同的觀察。黃厚銘(1998)提出能夠提供正確、有用資訊的「大鍋」對於平息網站爭端、網聚號召力等，比一般使用者大；同樣的，方念萱(1998)在討論全國布告欄女性主義連線版時，也發現資深使用者(heavy user)是社群討論的重心。Watson(1999)發現網路搖滾樂迷群以表露的知識(displayed knowledge)、出現頻率(repeated presence)與擁有錄音帶的數量，作為彼此共享的標誌。Jordan(1999)提出，網際空間是根據人們所使用的字詞品質(the quality of someone's words)而非傳統的社會階層來判斷人們的階層位置，線上階層的較高位置，是透過他們的書寫品質(the quality of their writing)來獲得尊敬。

本研究於《村上春樹的網路森林》的觀察發現，閱聽人以自我命名的方式，建構其線上世界的虛擬化身，而線上人格的穩定度，不只與其循環文本之發表數目、頻率和文字風格有關，若以相同名字連結線上身份與線下身份者，其線下身份的特質亦同樣影響線上身份的建立。對於前者而言，循環文本建立之線上人格穩定度，與黃厚銘(1998)、方念萱(1998)、Watson(1999)與Jordan(1999)等人的研究相同，出現頻率愈高、發表數量愈多、書寫品質愈高之線上身份，其擁有較高之重構階層位置，例如海豚(125篇)、旅北雁(46篇)與極限(34篇)等。對於後者而言，於線下世界已經建立足夠知名度者，其線下身份的特質會影響其線上身份的建立，並藉此提高其於線上世界之重建階層的位置，例如賴明珠、李友中、楊照、劉黎兒等人。

然而，本研究遭遇最大之困難點，在於難以確認閱聽人線上身份之轉換。若能瞭解閱聽人線上身份之轉換，將有助於瞭解其思辨歷程的演變，但是由於網路空間賦予閱聽人得以去除線下身份標記、自我操控線上身份建立之權力，使得閱聽人有權決定其線上身份建立之生死年限或是否同時建構數個線上身份等。本研究曾經考慮，若以投稿者寄發文件之IP位置作為辨別基礎，將可初步比對虛擬化身之轉換，但是此項做法卻有來自二方面考量的

困惑，一方面，投稿者寄發文件之 IP 位置屬於時報文化公司的商業機密與其對投稿者的保密承諾，即便經時報文化公司同意提供相關資料，但仍是於未取得投稿者同意之情況下進行比對，因此產生研究倫理的問題；另一方面，閱聽人主動進行線上身份的轉換，必定存在某些主觀因素考量（例如迷群態度轉變或從村上迷轉到反村上迷等），在尊重閱聽人主動建立線上身份之權力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強行比對其線上身份的轉換呢？因此，在眾多考量下，本研究雖然以作者名稱（筆名或姓名）作為主要判定線上身份建立的標準，輔以相關資料收集以判斷線上身份的轉換（如第三章第二節的討論），但是相關問題的考量如研究技術或研究倫理等，仍值得進一步討論。

本研究從檢閱閱聽人研究脈絡開始，一路找尋排除瞭解閱聽人思辨能力的困難與障礙，進而引用鄂蘭哲學思考體系作為解決方式。對於閱聽人研究而言，本研究認為鄂蘭哲學的引進，確實開啟一道瞭解閱聽人思辨能力之新的窗口，讓研究者得以重新重視「閱聽人」(audience)作為「人」(human being)的思考本質，提出思考的流動、自我摧毀、想像式巡訪與無家感狀態等特徵，作為解決觀察瞭解閱聽人思辨能力的參考。此項新的研究嘗試，仍存在許多未臻之處，本研究希望以此拋磚引玉，期待未來有興趣之研究者共同投入閱聽人思辨能力的探討。